

英汉习语翻译中译语文化的主导地位

【摘要】 由于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翻译实践中自然离不开怎样处理文化问题,因而有了依从于源语文化还是译语文化之争,特别是在英汉习语翻译时。因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差异极为明显,文化依从问题的处理是英汉习语翻译的难点,为此从读者与译者的关系、文化差异中意译的本质、衡量翻译质量的标准、文化的稳定性与渗透性四个角度论证了在英汉习语翻译中处理文化障碍时译语文化的主导地位。

【关键词】 英汉习语翻译;文化依从;译语文化;动态对等;主导地位

在翻译“Damon and Pythias”时,有人极力主张译成“达蒙和皮西阿斯”;还有人则极力主张译成“生死之交”、“莫逆之交”、“刎颈之交”,因为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达蒙和皮西阿斯”是何许人。究竟如何处理这一问题,这涉及到翻译中的文化问题,特别是在翻译这样的英汉习语的时候。由于地理、历史、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不同习语承载着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它们与文化传统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这给翻译带来极大的难度,同时也带来许多争议。习语中的文化因素处理常常是翻译中的难点。到底是以源语文化为中心还是以译语文化为中心?本文从下列几个方面来探讨译语文化在英汉习语翻译中的主导地位。

1 读者与译者

Newmark把二十世纪描写为“age of translation”或“reproduction”。这种说法颇有道理,因为世界上操各种语言的人们的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相当程度上是通过翻译来实现的。译者则担当起桥梁的作用,他最终的服务对象是读者。在这一过程中,译者必须考虑到两个方面的问题,译文即要再现源语信息,同时还要考虑到译文为读者所接受的程度,就如同加工厂里生产的产品(译文)必须被消费者(译文读者)认可一样。奈达指出,检验译文的重点,应该放在原作读者对原作品的反应以及译语读者对译作的反应上。这就把读者的因素放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范仲英也提出了类似的翻译标准。他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即源语)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即译语)表达出来,使译文读者能得到原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要使译文读者达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译者是要颇费一番功夫的。这是由于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不同,原作一般是针对于原文读者的要求、兴趣和文化背景写成的,所以原作采用的题材、体裁、内容以及表现手法都符合原作者读者的口味。而译文读者往往与原文读者处于不同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中,甚至是截然不同的时代。鉴于这种情况,译者要想方设法地采用各种补救方式以期使译文读者达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译者要充分了解译文读者的要求,特别是了解他们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审美心理,以便译文为译文读者所接受。正是出于以上考虑及经济简洁的原因,上面提到的例子译语文化里根本就没有“达蒙和皮西阿斯”一词,大多数译文读者根本不知“达蒙和皮西阿斯”为何许人,又怎能认可此译文?因此在进行翻译与文化相关的内容时,由于文化的差异对读者理解译文的程序有极大的影响,译者首先要考虑到读者是否能够理解这一点,而不能强求读者在读译文之前就已经知道“达蒙和皮西阿斯”类似于他所处文化环境中的“生死之交”。译者首先是为读者服务的,只能是译者适应读者,译文要让读者读起来自然、地道、舒畅,而不是读者为了理解译文而迎合译者去查经阅典,弄得疲惫不堪,最终失去兴趣。离开了读者,译者之劳作又有何意义?所以从译者与读者的关系出发,在处理英汉习语翻译的文化依从方面翻译应尊重译文中译语文化的主导地位。

2 意译与文化差别

直译与意译之争,源远流长,至今也从未间断。在现实翻译中,往往是两者兼而用之,相辅相成。有人曾这样定义“意译”“*Incorporating explanations to deal with cultural differences*”(尤金·奈达《论翻译》,1984),可见意译在处理文化差别中的地位。无论直译还是意译,两者的大前提都是忠于原文。对于从未接触过“达蒙和皮西阿斯”的译语读者,译语中出现未加任何注释的“达蒙和皮西阿斯”,也许表面上看起来是多么的“忠实”,但读者对此无任何概念,语言的源信息已全部丢失。若换做他所熟悉的“生死之交”(虽然未将“*Damon and Pythias*”两字直接译出),由于两者意义极其相近,可能更为读者所接受。傅雷主张“翻译应当像绘画中临摹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而“神似”在遇到文化障碍时只能通过意译才能实现。在意译中,译文只能通过译语文化的语言再现源信息。比如,“*She is a cat.*”若直译成“她是只猫”可谓词不达意,貌合神离,其实它的真正内涵是“她是位包藏祸心的女人”。又如,像“*paint the lily*”,“*meet one's Waterloo*”,“*cut the Gordian's knot*”等等,都是西方文化中的历史典故,其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要把这些历史典故译成汉语,既要熟悉西方的历史文化信息,更要熟悉中国的历史文化,从中找到联结点,才能把它们分别译成“画蛇添足;多此一举”,“败走麦城;惨遭失败”,“斩断死结;快刀斩乱麻”。意译的实质在于尊重译语文化,让读者对源语所表现的“意”有恰如其分的理解。

3 动态对等与文化差异

等值翻译是翻译界都想学到的上乘功夫,但要做到形式和功能完全对等决非易事,这里存在一个辩证统一的问题。由于传统的翻译检验存在主观性较强的内在问题,奈达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翻译观点,它更加客观、实际,要求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等值于原文读者的反应,要求译者寻求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ce*。由于译文读者(大部分不懂源语)是在一个文化、历史截然不同的环境里生长的,用不同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而文化的差异又往往是那样让人难以置信。要真正做到“等值”,这就要求译者寻求包含有相同(至少是最相近)的文化信息的语言,而非将源语文化信息硬译。如果译文所采用的是源语文化方式来传递信息,译文读者势必感到别扭、晦涩难懂,甚至误解,难道这会是最切近的自然对等?又怎能使两个读者的反应一致?“动态对等”可从功能的角度来解释,也可从风格(此文暂不谈论)和意义来探讨翻译中涉及的文化问题。意义始终是我们关注的中心,它既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的落脚点。文化的本身就是一种意义,作为文化载体的一种语言,其中的一个词,一个短语或一个句子,除了本身的意义外,在不同的文化中往往蕴含着一种深层的文化含义。如果把 *green eyes* 译成“绿眼睛”,中国人作何理解?所以只有依从汉语文化习惯译成“红眼病”。又如“*to rest on one's oars*”(暂时歇一歇),“*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奋力图存),“*all at sea*”(不知所措),因为英国是一个岛国,英国人常常与船和水打交道,而在汉语中却没有完全相同的对应习语。因而译者有必要遵循译语文化的习惯,这样译文与原文的意义(包括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才会一致,读者的反应才会与原文读者反应一致。

4 文化的稳定性与渗透性

由于翻译为各国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方便,各种文化的相互渗透也不可避免。Venutt 提出“*Resistance translation*”作为一种解决翻译中文化差异的途径,他认为翻译本身承担起文化交流的任务,读者完全有能力理解外来文化的“*foreignness*”,并能起到丰富译语文化的作用。也有人提出翻译“异化”,“洋化”,“西化”等观点。《新大英百科全书》把文化的内容概括为 *language, ideas, beliefs,*

customs , codes , institutions , tools , technique , works of arts , rituals , ceremonies , and so on。而所有这些都是某一群体千万年以来逐渐形成的集体 , 决非一日之寒 , 有相当的稳固性。各种群体可以相互了解彼此的文化差异 , 但如果把一种文化强加于另一种 , 带来的可能是仇恨和敌对 , 再者更不能随意把源语文化的价值体系植入译语中 , 特别是在习语翻译中更是如此。我们知道 “龙” 在英汉两种文化中的意义完全不同 , 所以汉语 “望子成龙” 中 “龙” 的形象在英译时就不能强加保留 , 只可意译为 “to expect one’ s s on to become an outstanding personage.” , 又如英语习语 “a cat on hot bricks.” , 形象是一只灼热的砖头上行走的猫 , 痛苦而狼狈 , 这个情景和汉语的 “热锅上的蚂蚁” 不谋而合 , 都表示 “焦急而狼狈” , 翻译时更换形象 , 这样更利于读者的理解。当然 , 尽管文化具有相当的稳固性 , 但也并非一成不变 , 它随社会内部结构 , 物质条件等方面因素的改变而改变 , 也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而被渗透 , 但后者因素的变化相对来说是较小的、缓慢的。译语中可包含一些源语的文化因素 , 但并不意味着译语应以源语文化为中心。翁显良先生 (《意态由来画不成》1983) 认为翻译 “不能不现代化 , 而且要不断现代化 , 过了时期又得把译过的作品重译” 正好证实以译语文化为中心的翻译观点。用源语创作的原文总是一成不变的 , 而译语总是在不断变化的 , 译语文化也是不断变化的 , 这些变化的因素要求译文相应的变化。正如 100 年前 , 把 “All roads lead to Rome” 译成 “殊途同归” 较为合适 , 而今天译成 “条条道路通罗马” 更好 , 因为汉语已接受 “罗马” , 这一词已融入 “Rome” 所蕴涵的文化信息。也许若干年后 , “达蒙和皮西阿斯” 也会被中国人接受。

除受外来文化影响的部分源语文化被译文读者所接受 ,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译语自身内部的变化。例如解放前及解放初 , 由于当时社会阶层的贫富分化 , 农民普遍受文化教育程度低 , 愚昧、落后、贫穷 , 所以把那时的 “农民” 译成 “peasants” 似乎也不为过 (当然也还不能完全等同) 。随着农民社会地位的改变 , “农民” 所带文化信息也在改变 , 目前我汉语中的 “农民” 和英语中的 “peasants” 内涵就有了较大区别 ,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名词 “农民” 不带任何贬义 , 应用 farmers 表示更为合适。因此 , “农谚” 一词应译为 “farmer’ s proverb” 或 “farmer’ s saying” 为佳。因此 , 译语文化的不断变化、发展 , 各文化之间相互渗透要求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译本出现。奈达提出 “一部译作 , 不管它多么接近原作 , 多么成功 , 其寿命最多只有五十年” 是有道理。这也是我国翻译界中出现大量重译和复译现象的原因。

综上所述 , 笔者认为英汉习语翻译中遇到文化障碍时 ,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 采用译语文化为中心的翻译是较合理的选择。要想使译文传意 , 甚至传神 , 首先必须克服两种语言所负载的不同的文化差异。而要想在英汉习语翻译实践中克服两种语言所负载的不同的文化差异 , 使译文更受译文读者的青睐 , 把译语文化置于主导地位是无庸质疑的。

【参考文献】

- [1] Claire Krams , Language and culture [M] .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20001
- [2] 邓炎昌 , 刘润清 1 语言与文化[M]1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19891
- [3] 刘宓庆 1 文化翻译论纲[M]1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 19991
- [4] 谭载喜 1 新编论翻译[M]1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 19991
- [5] 王福祥 , 吴汉樱 1 文化与语言论文集[M]1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19941
- [6] 许 钧 1 翻译思考录[M]1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 19981

- [7] 杨自俭,刘学云 1 翻译新论 1983— 1992[M]1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1
- [8] 周 仪,罗 平 1 翻译与批评[M]1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1
- [9] 范仲英 1 实用翻译教程[M]1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41
- [10] 张 宁 1 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及翻译[J]1 中国翻译 ,1999, (3) :23— 251
- [11] 秦秀白 1 当代英语习语大词典[M]1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1

51lunwen.org

英语论文网

51lunwen.org